

在莒县流传着这么一句话,莒县有三宝:羊肉、银杏和苏老。苏老名叫苏兆庆,莒县博物馆原馆长、研究员,莒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总顾问。2017年10月8日,痴迷莒文化一辈子的苏老走了,享年83岁。苏兆庆从事文博工作一甲子,是莒州博物馆的创建者和莒文化研究的开拓者,为海岱文明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苏兆庆的研究要从“日月山”陶文大口尊说起。1969年,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,将在北京举办出土文物展,各省选派文物参展。当时,山东省内没有新出土的文物,便将这工作交给了莒县文化部门的苏兆庆,让他带着前些年发现的“大炮弹”进京参展。

“大炮弹”学名大口尊,每个都有半米高,出土于1960年的莒县陵阳河。那年春天莒县大旱,连续46天无雨。到了夏季,普降暴雨,导致山洪暴发,陵阳河河崖里冲出三个大陶器,看起来像三个大炮弹。得到消息后,苏兆庆赶紧赶到现场保护起来,待洗刷干净后,才发现每件器物胸部都刻有简单的图画。

接到进京任务后,苏兆庆找出了沉寂十年的大口尊,装在箱子里捆起来。前胸后背各一个,手上提一个,坐上县汽车站的汽车,踏上了进京路。此时,他并不知道这次行程将改变他的命运。

展览中,陶制的大口尊算不上名贵精美,苏兆庆并没有对它们抱大期望,然而,上面的刻画图案却引发了北京专家的热烈讨论,成了“明星”展品。没想到,“日月山”图案经专家考证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文



【故人】

□张九龙

莒文化研究第一人 苏兆庆：

字,比甲骨文还要早一千年。古文字学专家唐兰先生甚至表示:“陶器文字,既不是符号,更不是图画,而是很进步的文字,是商周时代文字的远祖。”这一发现,改写了中华民族的文字史,海内外学者纷纷撰文,由此掀起了讨论中国文明的热潮。苏兆庆万万没想到,“大炮弹”竟是如此了得的大宝贝。然而,因为大口尊是水冲出来的,

【老照片】

奶奶是位老党员

□季臣新口述 李义福整理

这是一张40多年前的照片。照片上的老人叫吕桂荣。“奶奶是1947年加入组织的老党员。这是奶奶带着我俩到县城赶集时照的,那一年我9岁,哥哥10岁。”转眼间奶奶去世已有7个年头,季臣新端详着这张褪色变黄的老照片说,那时候的奶奶绝不会想到,小哥俩长大后会先后加入党组织。

1947年的夏天,吕桂荣生下一个男婴,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差,孩子生下来高烧不退,没几天就夭折了。几乎在同一时间,附近村的一户张姓人家也生下一个男婴,因为母亲没有奶水,家里人就把孩子托付给吕桂荣“奶养”。

几个月后,男婴的舅舅从外地回家探亲,后来才听说他是解放军的干部,叫王敬异,是悄悄潜回来建立地下组织的。在与吕桂荣见过面后,王敬异了解到这位穷苦人家长大的妇女曾经闯过关东,不仅性格直爽刚烈,说话做事干练利索,还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烧杀抢夺的累累暴行,是块能为党做事的“好料”。因此,便发展她加入了党组织。

吕桂荣入党后,不怕苦累,想方设法组织筹粮筹款、照料伤员、缝衣做鞋支援前线。她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圆满完成组织交办的“特殊任务”,因此经常受到组织的表扬,被评为“支前模范”。新中国成立后,吕桂荣担任村里妇女主任一干就是30多年,可谓劳苦功高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作为基层先进模范,吕桂荣参加了山东省妇女代表大会,还曾被推选为党代表,光荣出席了夏津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。



康有为的晚年在青岛度过。1917年,康有为初至青岛,便极是留恋,说这里是终老之地,1924年买下一栋始建于1899年、原是德占时期总督府要员官邸的小楼,即如今的福山支路6号,命名为天游园,更有“青岛此屋之佳,吾生所未有”和“此屋卑小而园甚大,望海碧波仅距百步”的说法,数年后,他在此宅中去世。

福山支路是一条蜿蜒直下的石板路,上接福山路,背靠小鱼山,面朝汇泉湾。小鱼山本就为众多名人故居所环绕,康有为这一处的位置可谓最佳,能看到那湛蓝的海和汇泉湾全貌。晚年的康有为,曾在书中说自己以“卧榻听涛”为乐,不过如今能听到的恐怕只是车声。

在我年少时,康有为故居仍作为民居使用——那时,青岛的众多名人故居都是如此待遇,几户乃至十几户人共住一楼,甚至谁也不知道这楼里住

【旧地】

□叶克飞

坐看花开,卧听涛声 青岛康有为故居：

过百米的半山欧式庭院已成了康有为故居纪念馆,被修葺一新,好在墙面上的粉与白还不算太刺眼。

门口的“康有为故居”题字是康有为的弟子刘海粟晚年所书。院外有笔直的法国梧桐和梅花间竹般的紫薇,院内有高高的银杏,这栋三层德式小楼便在银杏的遮蔽之下。故居内循例是纪念馆式的格局,正中有康有为的塑像与照片,还摆放着雕花精致的红木家具。地板和楼梯都如青岛的其他德式老楼般,均为木制,踩上去后吱吱作响。二楼的房间用来展示康有为生平,无非是一些老照片和老物件。走上三楼,却是别样寂静,走廊尽头是半开着的木楼窗,窗棱触碰着窗外那株银杏的繁茂枝叶,随着微风各自摇摆。

康有为的卧室也在三楼,那套红木家具上的细致雕花,繁复得令人眼花缭乱。据说,这

后组织发掘了莒县陵阳河、大朱家村、杭头、马庄等大汶口文化、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遗址,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。考古发现证实,在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的千余年里,这里的农业、畜牧业、手工业等方面都比较发达,特别在手工业方面,在同时期原始文化中处于领先地位。

苏兆庆将精力投在了研究莒地早期文明这个课题上,提出了莒文化的概念。正是在苏兆庆几十年的奔走呼吁下,莒文化从无到有,由模糊到清晰,最终得以与齐文化、鲁文化三足鼎立。

苏兆庆认识到,莒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,还应让更多公众接触认知,博物馆显然是最好的平台。从20平方米到200平方米、2000平方米,再到2万平方米。从文物管理所到博物馆,莒县博物馆倾注着苏兆庆的毕生心血。

除了考古挖掘,民间收集也是积累文物的重要途径。上世纪80年代初,苏兆庆到一个熟人家串门,熟人的邻居说有个壶,愿意10块钱卖给苏兆庆。苏兆庆仔细看了壶,器物构思独特,制作精美,有心入手。结果两人价格没谈拢,那人揣了壶就走。苏兆庆怕夜长梦多,赶紧找人追回来,给了他10块钱。后来经鉴定,这把壶居然是国家一级文物。在莒县,苏兆庆脍炙人口的“淘宝”故事还有许许多多,如痴如醉的他给博物馆攒下了殷实的家底,才有了四次扩建博物馆的佳话。苏兆庆不慕名利,为莒文化的挖掘和弘扬忙碌了一辈子,难怪家乡人尊称他是莒县“三宝”之一。

【饮饌琐忆】

烧秋

□张庆余

有人说,秋天长了一张火烧云的脸,从盘在头顶的晚霞,到唇上胭脂染过的枫叶,从挂满枝头的石榴、柿子,到精光锃亮的红枣耳坠,都是红彤彤的模样。而我说,在这个收获的季节,“烧秋”是我孩童记忆里最难忘的野趣。

烧秋,就是把已经或即将成熟的大颗粒的庄稼,在田野里弄些干柴草烧熟了吃。吃这样的“野餐”,多半不是为了充饥,而是为了解馋,因为它的香味太馋人了。

年少时,我和小伙伴们常干些烧秋的事,且所烧的吃食种类也颇为丰富。

烧毛豆是其中的“重头戏”,因为这来得最容易——随便从已经成熟了的豆田里,拔一把豆棵,再从地里收拢一些豆叶,放在地头,用火柴点燃,将豆棵放在火堆里烧。当豆叶烧完了,豆荚也就烧熟了。豆粒儿若是已经熟透了,在被烧的过程中还会发出“啪啪”的炸裂声,像燃放的小鞭炮那样好听。尚未成熟的豆粒儿,仍旧藏在豆荚内,但照样能被烧熟。为了好捡熟豆,需先用草帽或褂头,将叶灰煽跑,露出黄澄澄的豆粒儿或灰绿的豆荚。这时候,大伙儿便蹲在周围,用手捡豆粒或剥豆荚来吃。烧裂的干豆粒儿,炸缝里溢出的香气能飘老远,吃起来更是满嘴留香。带荚的豆粒儿,虽闻不到香,但剥食时的面香也充满口腔,回味无穷。

花生、玉米,烧起来不如大豆容易。因为花生粒儿大,外壳也厚,烧的时间就比较长。烧玉米时,不能把玉米皮剥干净,需留下几层内皮,以免把粒儿烧糊。吃烧熟的花生或玉米,照样是满口喷香,百吃不厌。

烧地瓜最不容易。因为地瓜个头大,皮儿薄,含水量高,如果直接用火烧,会烧得“皮焦骨头生”,并不好吃。因此,小伙伴们便用“窑烘”的方法——在烧地瓜之前,先在地面上挖个浅坑,再用捡来的土坷垃,沿坑边儿往上垒,像垒窑洞似的,只留一处续柴草的门。垒成后,像烧火做饭那样,把预先搜集起来的柴草点燃,直烧得坷垃发红。这时止火,把地瓜填进去(一次可填数块),然后用脚将热坷垃踩塌,使之盖严地瓜。

等待的时间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。秋日里有高高的云,凉凉的风,金色的田野,还有等待美食出炉的小激动……估摸着地瓜烧熟了(实际上是烫熟的),大家争先恐后地扒土掏瓜吃。这样烧的地瓜,皮儿不焦,瓤儿又面又甜,远比蒸或煮的好吃得多。

烧秋,不止是烧庄稼,有时我们还会烧蚂蚱、蛐蛐吃。过去,田间的蚂蚱、蛐蛐挺多,特别是秋收时节,这些昆虫都长得很肥实。土里来土里去,那时候的孩子不做题,不读书,总是呼朋引伴地去逮虫子。用不了多大会儿,便能捉到好多只,用一根狗尾草的梗儿从它们的脖子处穿成串儿,放到火堆里烧。烧熟后,它们的翅膀、腿已被烧掉,只剩下金黄流油的身子,吃起来脆香多汁,别有一番风味。

烧秋比较时兴的年代,主要是在农村尚未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时期。那时,生产队里的庄稼虽然有人看护,但一般看护得不严,护秋者对烧秋的孩子们的所为也很宽容,“生瓜梨枣,见了就咬”,还不就是平常小事?推行生产责任制后,田归各户经营,很少有人再损坏别人的庄稼了,烧秋现象也就逐渐消失了。但每每想起这种事儿,那趣,那味,似乎意犹未尽。